



严复

(1854~1921)

[]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变法运动中维新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字又陵，又字几道，福建侯官（今福州）人。青年时代曾被清政府派往英国皇家海军学院学习，回国后长时期在清政府北洋海军的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任职。他翻译过多种西方国家的学术著作，是中国近代第一个系统地介绍“西学”即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人。

严复的经济思想，主要体现在他所翻译的 A. 斯密的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严译名《原富》）的“译事例言”和“按语”中。该译本于1902年出版，这时正是中国资本主义生产获得初步发展的前夕。严复的经济思想典型地体现了当时一些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商人、地主和官僚投资兴办新式工商业的要求。

宣扬经济自由主义 严复经济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是直接用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作为理论武器，为发展民族工商业的要求服务。他自称所以首先翻译斯密的这部著作，就是为批判清政权压制私人资本的政策提供思想武器。因为斯密所指斥的“当轴之迷谬”，也是清朝廷“言财政者之所同然”。他宣称只有个人最了解自身的利益，因此，只有给个人以从事经济活动的充分自由，才能“利民”，只有“利民”，才能使国家富强。他猛烈抨击洋务派对新式工业的国家垄断，尤其是洋务派的官督商办形式，是对人民的掠夺和对国家资财的极大浪费，并使国家在经济上愈来愈“仰鼻息于西人”，从属于外国资本势力。

对传统的“本末”论和“奢俭”论的改造 严复用中国固有的“本末”范畴来分析农业和工商业之间的关系，认为“地为百产之宗”，只有在农业中才能产生出“赢”（剩余），农业中的“赢”是工商业得以独立存在的“本”（基础）。同时，他又认为工商业也是维持人们生活所必不可少的，并且对农业有促进作用，如果工商业不发达，农产品无法销售，农民会陷于破产以至抛弃土地而去。因此，他坚决反对封建主义的“重本抑末”论，强调工商业和农业“于国为并重”。

严复用传统的“奢俭”范畴来说明积累和消费的关系 他认为俭所以可贵，是因为俭可以“有所养”、“有所生”，否则，就不仅不可贵，而且是“财之蠹贼”。他所说的“有所养”、“有所生”的“俭”，是指把消费节余下来的财富积累起来，作为扩大再生产的基金，进行资本的增殖。

严复还认识到消费对生产也有促进的一面，在一定条件下增加消费可以扩大商品的需求，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和资本的积累。因此，“俭”和消费的增长并不总是不相容的。他坚决反对传统的“黜奢崇俭”论，而提出了“母财（资本）支费（消费）相酌剂为盈虚”的“理富之术”，主张在不影响资本积累的增长和生产扩大的前提下适当增加消费。

由此可见，严复虽然继续使用着“本末”、“奢俭”等中国固有的经济范畴，但他用以分析、说明的已不是封建主义的经济关系，而是资本主义的农业和工商业关系以及消费和资本积累之间的关系了。

严复的其他经济思想 在利润率和利息率的关系上，严复认识到，只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利息才是利润的一部分，利息率才受平均利润率的限制；资本主义以前的高利贷资本的利息率，是不受利润率限制的。

严复还谈到：一定量的货币积累，只有在“相督”（役使和剥削雇佣劳动）时才能够保持和增殖自身，否则就只能为它的所有者作为消费基金而“坐食立尽”。

但是，严复在大多数经济理论问题上，并未接受斯密的合乎科学的见解，而是接受了庸俗的政治经济学观点。例如，他用供求论来解释价值，用“监督工资”论来说明利润等等。在地租和土地问题上，他更一反古典学派仇视土地所有者的立场，赞美拥有土地

的地主既可享受地租和地价涨的利益，使自己“所收日多”，又可享受“有地之荣”，以抬高自己的身份和社会地位，这是比开办工商业更为有利的投资方式。这种论调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同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一个明显的表现。



严复

(1854~1921)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变法运动中维新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字又陵，又字几道，福建侯官（今福州）人。青年时代曾被清政府派往英国皇家海军学院学习，回国后长时期在清政府北洋海军的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任职。他翻译过多种西方国家的学术著作，是中国近代第一个系统地介绍“西学”即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人。

严复的经济思想，主要体现在他所翻译的 A. 斯密的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译名《原富》）的“译事例言”和“按语”中。该译本于1902年出版，这正是中国资本主义生产获得初步发展的前夕。严复的经济思想典型地体现了当时一些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商人、地主和官僚投资兴办新式工商业的要求。

宣扬经济自由主义 严复经济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是直接引用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作为理论武器，为发展民族工商业的要求服务。他自称所以首先翻译斯密的这部著作，就是为批判清政权压制私人资本的政策提供思想武器。因为斯密所指斥的“当轴之迷谬”，也是清朝廷“言财政者之所同然”。他宣称只有个人最了解自身的利益，因此，只有给个人以从事经济活动的充分自由，才能“利民”，只有“利民”，才能使国家富强。他猛烈抨击洋务派对新式工业的国家垄断，尤其是洋务派的官督商办形式，是对人民的掠夺和对国家资财的极大浪费，并使国家在经济上愈来愈“仰鼻息于西人”，从属于外国资本势力。

对传统的“本末”论和“奢俭”论的改造 严复用中国固有的“本末”范畴来分析农业和工商业之间的关系，认为“地为百产之宗”，只有在农业中才能产生出“赢”（剩余），农业中的“赢”是工商业得以独立存在的“本”（基础）。同时，他又认为工商业也是维持人们生活所必不可少的，并且对农业有促进作用，如果工商业不发达，农产品无法销售，农民会陷于破产以至抛弃土地而去。因此，他坚决反对封建主义的“重本抑末”论，强调工商业和农业“于国为并重”。

严复用传统的“奢俭”范畴来说明积累和消费的关系 他认为俭所以可贵，是因为俭可以“有所养”、“有所生”，否则，就不仅不可贵，而且是“财之蠹贱”。他所说的“有所养”、“有所生”的“俭”，是指把消费节余下来的财富积累起来，作为扩大再生产的基金，进行资本的增殖。

严复还认识到消费对生产也有促进的一面，在一定条件下增加消费可以扩大商品的需求，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和资本的积累。因此，“俭”和消费的增长并不总是不相容的。他坚决反对传统的“黜奢崇俭”论，而提出了“母财（资本）支费（消费）相酌剂为盈虚”的“理富之术”，主张在不影响资本积累的增长和生产扩大的前提下适当增加消费。

由此可见，严复虽然继续使用着“本末”、“奢俭”等中国固有的经济范畴，但他

用以分析、说明的已不是封建主义的经济关系，而是资本主义的农业和工商业关系以及消费和资本积累之间的关系了。

严复的其他经济思想 在利润率和利息率的关系上，严复认识到，只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利息才是利润的一部分，利息率才受平均利润率的限制；资本主义以前的高利贷资本的利息率，是不受利润率限制的。

严复还谈到：一定量的货币积累，只有在“相督”（役使和剥削雇佣劳动）时才能够保持和增殖自身，否则就只能为它的所有者作为消费基金而“坐食立尽”。

但是，严复在大多数经济理论问题上，并未接受斯密的合乎科学的见解，而是接受了庸俗的政治经济学观点。例如，他用供求论来解释价值，用“监督工资”论来说明利润等等。在地租和土地问题上，他更一反古典学派仇视土地所有者的立场，赞美拥有土地的地主既可享受地租和地价涨的利益，使自己“所收日多”，又可享受“有地之荣”，以抬高自己的身份和社会地位，这是比开办工商业更为有利的投资方式。这种论调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同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一个明显的表现。

文档附件：

编辑： 文章来源：

版权所有：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E-mail: ios@cass.org.cn

欢迎转载，敬请注明：转载自《中国社会学网》[<http://www.sociology.cass.cn>]